

毛泽东对美军事战略思想论析

● 施恒骁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在相当长时期内都是中国的最大威胁,对美军事斗争一直是毛泽东思考的首要战略问题。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战略家,积累了在战略上同美国进行军事斗争的丰富经验。深入探讨毛泽东对美军事战略思想,对于正确处理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中美军事战略关系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对美斗争;战略思想

中图分类号:E297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451(2011)03-0005-07

作者:施恒骁,后勤指挥学院讲师,博士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积累了在战略上同美国进行军事斗争的丰富经验。毛泽东对美军事战略思想,以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为前提,深刻影响了特定历史时期党对美国的外交和军事政策。探讨研究毛泽东对美军事战略思想,对于正确处理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中美军事战略关系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一、对美国应该既怕又不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是当时的头号世界强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军事力量。为了遏制共产主义,称霸世界,美国对中国和苏联等国进行军事威胁和战略包围,到处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美国有一种恐惧心理。然而,毛泽东基于同美国打交道的斗争实践,从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来认识美国。他认为,对美国应该既怕又不怕。他曾经指出:“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①“既怕”,是指美国以及一切反动派是“真老虎”,要在战术上、策略上、每一个局部上、每一个具体斗争问题上,重视敌人,采取谨慎态度,讲究斗争艺术,以便一步一步地孤立敌人和消灭敌人;“又不怕”,是指美国以及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必须在战略上、全体上藐视敌人,敢于同他们斗争,敢于夺取胜利。

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首次提出他的“纸老虎”论,他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②在这篇谈话里,毛泽东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点。这个论点的提出是与美国支持蒋介石集团反共政策紧密关联的。1945年,随着抗日战争即将结束,国民党统治集团逐渐把重心转移到消灭共产党上来。国民党的反共方针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美国企图通过支持亲美的蒋介石集团达到控制中国的目的。因为美国扶蒋反共,毛泽东对美国的态度发生逆转,由抗战期间的希望与美国合作转变为对美国的强烈不满。1945年4月2日,赫尔利发表扶蒋反共演说,标志着美国反共政策的明朗化。同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内部报告中明确提出,要警惕新的外来干涉的危险,要警惕斯科比式的人物。同年6月6日,美国发生《美亚》杂志事件案,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和其他五名主张对中共友好的美国人士因所谓通共间谍罪遭

到逮捕和审讯。这表明赫尔利等人主张的扶蒋反共政策已被确定为美国的对华政策。这时,毛泽东已经深刻认识到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极度危害性,并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他激烈批评并预言:“假如赫尔利政策继续下去,美国政府便将陷入中国反动派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把它自己放在已经觉醒和正在继续觉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敌对方面,在目前,妨碍抗日战争,在将来,妨碍世界和平。”^③1946年6月1日,毛泽东在给中原军区政治委员郑位三等人的电报中明确指出:“美蒋对我极为恶劣,全面内战不可避免。”^④当月底,国民党统治集团发动了全面内战。美国站在蒋介石一边,又有大量美军驻华,因此,“恐美”心理成为与蒋大决战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点,武装了中国人民的思想,加强了中国人民的信心,在解放战争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几次提到“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等问题。毛泽东把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看做纸老虎,都是从它们的本质说的。正如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写的《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中指出:“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⑤这个战略思想,在今天仍然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尽管说毛泽东多次提出“纸老虎”论,但是,他并不是一味轻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相反,他认为它们也是真老虎。他在《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一面,真老虎,吃人,成百万人成千万人地吃。”^⑥正因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又是真老虎,所以,毛泽东提出要在战术上、策略上重视它们,建立自己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讲究斗争艺术,使它们由真老虎转化成纸老虎。

二、摸清美国战略底牌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就曾预料:“美国在中国大陆的赌博已经彻底输光,剩下一个台湾,似乎还想在那里打点什么主意。”^⑦不出毛泽东所料,美国果然在台湾问题上大做文章。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派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朝鲜停战后积极插手台湾问题,加紧与台湾当局谈判缔结所谓“共同防御条约”,推行其分裂中国的阴谋。对此,毛泽东认为,美国意图制造台湾海峡两岸的永久分离,进一步从台湾这条战线威胁中国的安全。在第一次台海危机中,美台签订了非法的“共同防御条约”,条约规定了美国负责维持和发展台湾武装力量以及防守台湾的义务,把防守范围规定为台湾和澎湖,但是对是否负责保卫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因此必须摸清美国的战略底牌。

第一次台海危机后,美国对于中美大使级会谈缺乏诚意。进入1957年,美国对台湾海峡的军事干涉有增无减,和蒋介石集团进一步在台湾海峡加紧军事部署,纵容蒋介石集团对大陆沿海骚扰破坏,再次制造紧张局势。这一切使毛泽东感到,在近期内与美国和蒋介石和平谈判解决台湾问题似不大可能,并认为对于美蒋的武装挑衅决不能示弱。这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再次炮击金门,其一个重要目的在于探明美国协防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的决心。恰在此时,美国在中东烧了一把火,使国际局势骤然紧张起来。1958年7月15日,美国以“保卫黎巴嫩主权”为名,公然出兵在黎巴嫩登陆,干涉黎巴嫩人民反对亲美的夏蒙政权的斗争,引起了各方关注。中东事件分散了美国的注意力,降低了它对台湾海峡的反应能力。毛泽东抓住这个时机,果断地作出炮击金门的决策。当年受命指挥金门炮战的叶飞这样回忆道:“主席的意图是要摸美国人的底。美国有表面上气势汹汹,究竟敢不敢和我们打……金门炮战,是我们与美国互相摸底的一出戏,一出很紧张很有意思的戏。”^⑧

金门炮战,首先是侦察美国政府在协防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上的态度。1958年8月25日,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说:美国同国民党订了共同防御条约,防御范围是否包括金门、马祖在内,没有明确规定。美国人是否把这两个包袱也背上,还得观察。打炮的主要目的不是侦察蒋军的防御,而是侦察美国人的决心,考验美国人的决心^⑨。其次,是摸清美国政府在台海问题上的介入程度。1957

年 5 月,美国已决定派遣一支导弹部队驻在台湾。同年 11 月,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海面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1958 年 5 月,美国在台湾成立了“美军驻台协防军援司令部”。尤其是,在得知中共中央准备炮击金门的情况下,美国决定采取“战争边缘”政策,企图对中国政府进行战争威胁。所有这些军事行动表明,美国正在介入台海争端。但是美军介入程度到底如何?这在当时并不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所知悉,必须通过一定方式的军事行动来侦察和摸底。同年 8 月 23 日,炮击金门作战正式开始。炮击金门使美国慌了手脚,急忙调太平洋第七舰队主力和第六舰队一部前往台湾海峡,并且派出美舰给蒋军护航。这给继续开展炮击金门的斗争带来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对付护航的美舰。通过炮击行动,美舰不但没有还击,反而掉头就跑,完全弃蒋舰于不顾。这说明,虽然美国与蒋介石集团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但是,美国实际上并不轻易冒险同中国政府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当时美国对台海的军事介入程度十分有限。此外,中国还通过其它方式来侦察美国人的决心。当时,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只承认别国的领海宽度为 3 海里,而中国对于自己的领海范围还没有明确的规定。为了进一步试探美国的战略底牌,同年 9 月 4 日,中国政府发表《关于领海的声明》,宣布中国的领海宽度为 12 海里。美国沉不住气了,就在中国发表声明的当天,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发表声明,亮出了底牌。这个声明向中国发出了和谈信号,暗示美国并没有放弃通过中美大使级会谈解决台湾问题的希望。9 月 5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五次会议上讲话中,谈到对美斗争的问题,他提出了这么一个判断,即美国人和我们都怕打仗,但是谁怕得多一点呢?是杜勒斯怕我们怕得多一点^⑩。毛泽东除了在实战中试探美国的决心之外,还决定通过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对美国进一步摸底。经过几个回合的试探,毛泽东判断美国要保台湾,但不一定要保金门、马祖,美国有可能企图放弃金、马换取中国承认美国在台湾的存在。根据这个基本判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之后调整了对美、对蒋的斗争策略。

三、不打无准备之仗

不打无把握或无准备之仗,是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历次军事斗争中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1958 年炮击金门前夕,为慎重起见,毛泽东写给国防部长彭德怀和副总参谋长黄克诚的信中说:“不打无把握之仗,必须坚持。”^⑪20 世纪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初,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逐步恶化,毛泽东对世界战争与和平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他不再单独地强调“新的世界大战是能够制止的”,而是提出世界大战具有可以避免和不可以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并特别强调“应当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他说:“世界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⑫

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的周边环境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国家安全面临的现实威胁越来越严重,逐步处于四面包围之中。中国北方,由于中苏关系破裂,苏联开始在中苏、中蒙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部署,扩大边界冲突,对中国加大军事压力;东南方向,台湾蒋介石集团企图趁机反攻大陆;西南边境,印度当局加紧蚕食中国领土,进行武装挑衅,继 1962 年爆发中印边境武装冲突后,中印边境长期处于紧张的军事对峙状态。东北方向,美国加强在东北亚的军事建设,同时在中国南部方向——越南南方发动“特种战争”,并逐步升级越南战争,将战火烧到中越边境,威胁着中国安全。特别是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后,美、苏从南北方向威胁进攻中国,使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军事压力。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的毛泽东,对国家的安全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密切注视着周边安全形势,尤其是越南战争的发展。因此,他多次强调“要准备打仗”。不仅要准备一个方向的独立作战,而且要准备两面作战,指出:“我们要准备,不但准备帝国主义整我们,还要准备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合伙整我们”^⑬。这个阶段,毛泽东对战备工作作出一系列指示,包括三线建设问题、作战方针和作战方法问题、后勤保障问题等,要求地方抓军事,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针对当时有人存在“各省搞战备怕敌人不来用不上”的顾虑,毛泽东对此明确指出:“一定要搞,准备好了敌人可能不来,准备不好敌人就可能来,敌人来了总要打掉一些坛坛罐罐。不是浪费,敌人不来也不是浪费,你说浪费就浪费,浪费也不可惜,一定要搞。……把一切都准备好,准备好了,敌人要来也好办,趁我们还在的时候再打它

一仗,也好。”^⑭在“备战”思想的指导下,1965年4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该指示主要是针对美国扩大越南战争,对我构成严重安全威胁而发出的。指示提出:“在目前形势下,应当加强备战工作。……要估计到敌人可能冒险。我们在思想上和工作上应当准备应付最严重的情况。……我们对小打、中打以至大打,都要有所准备。这样,对我们只有好处,没有什么坏处。只要我们做好一切准备,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们就立于不败之地,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13日,毛泽东在这一指示上批示:“已阅,同意”^⑮。

面对美国和苏联对我的战争威胁,毛泽东认为要做到全面多种准备。一是做好政治上的准备。在战中做好政治上的充分准备,是毛泽东对美斗争的一个重要策略。主要内容有:搞好内部的事情,加强党内统一,团结全国群众,做好军队政治工作,揭露对手的战争阴谋和侵略实质,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分化瓦解敌人等。上述手段的运用,使新中国树立起了正义而又强大的政治形象,这也正是美国的惧怕所在。二是做好军事上的准备。主要内容有:(1)准备好人民战争的战场。毛泽东坚信:“进行人民战争,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可以打败的。”^⑯为在战争爆发时能够切实发挥人民战争的优势,毛泽东强调要创造好人民战争的战场:在精神上,动员全国人民提高警惕,准备反击侵略者;在人员上,动员人民参加民兵民防;在战备交通通信上,铺设了多条铁路、工程和地下光电缆;在战备工地上,建设了大量防御工事、阵地道路、炮兵阵地、导弹营地和综合仓库;在指挥工程上,建设了能防化学武器和核武器的地下指挥工事;在战场建设上,构筑了大量的野战工事和反坦克壕沟、雷场、地道网;在大后方建设上,从1964年左右开始,大规模地拉开了全国、全民建设大、小“三线”的序幕。(2)发展尖端武器。面对美苏对我国的核威胁,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⑰。1958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提出,我们也要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根据这一重大决策,1964年10月,我国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我国成功进行了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两弹”研制成功,标志着人民解放军有了核反击的能力,打破了帝国主义的核垄断。(3)因敌实施训练。毛泽东在1964年《对部队军事训练的若干指示》中指出,“要注意多搞夜战、近战。训练部队晚上行军,晚上打仗。”^⑱1965年他又指出,在纵深地区,都要准备敌人空降,都要有防空降的准备^⑲。三是做好经济上的准备。主要内容有:(1)改进经济布局。1964年4月,军委总参谋部提交了一份关于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⑳,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从而出现了“三五”计划向“备战计划”的急速调转,“三线”建设由此成为国家生活的主轴。三线建设规模宏大,在10年中共投资2050亿元,占同期基本建设基金的43.4%,使国家经济布局趋于合理,调整了国防潜力布局,增强了国防经济和工业支持大规模反侵略战争的能力。(2)加强物资储备。朝鲜战争结束后,为应对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中国大幅度地提高了战略物资储备水平,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全国都在“备战备荒”、“深挖洞,广积粮”。(3)推进军民结合,平战结合。1956年,毛泽东指出:“学两套本事,在军事工业中练习生产民用产品的本事,在民用工业中练习生产军事产品的本事。这个办法是好的,必须如此做。”^㉑在生产上要注意军民两用,注意学会军用和民用的两套生产技术,要有两套设备,平时为民用生产,一旦有事,就可把民用转化为军用生产。1957年后,特别是在1958年大跃进期间,军工企业大力开发了一批民用产品,建立了不少民用生产线。1960年,中央军委提出了军民结合、平战结合、以军为主的方针。全国大备战期间,地方经济建设更多地考虑了国防和战备的需要,同样在军工企业大发展的同时也生产了不少民用产品。

四、争取“两个中间地带”

20世纪50、60年代,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空前高涨,美国和苏联的盟国独立自主的倾向开始发展。毛泽东根据世界格局的变化,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理论。他说:“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㉒毛泽东这时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就是希望把两个中间地带的国家作为反对美苏两霸的战略制衡力量。

冷战伊始,出于“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需要,美国先后同拉丁美洲、欧洲、亚洲等 40 多个国家结成军事或安全联盟。在亚洲,美国同日本、菲律宾和南朝鲜等国分别签订双边军事条约,对中国安全构成潜在威胁。20 世纪 60 年代初,中苏关系开始恶化,美国发动越南战争,伺机侵略中国,美国 and 苏联对中国形成南北夹击态势。为了打破这种不利的安全局面,毛泽东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理论。这时,尽管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成为中国外交战略重要目标之一,但是毛泽东仍把美国作为中国和全世界人民的主要敌人。“两个中间地带”论的核心,在于指出当时国际政治斗争的中心是“美国反动派与世界人民的对立”,而不是美苏之争。1963 年至 1964 年,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以及会见日本友人的讲话中,毛泽东系统阐述了“两个中间地带”理论。他把亚、非、拉当作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第一个中间地带,把欧洲、加拿大、大洋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划分为反对美国控制干涉的第二个中间地带。这时,毛泽东不再把帝国主义看成铁板一块,帝国主义联盟是可以被分化的。这为中国外交利用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提供了机会。这一时期,为了集中力量反对对中国威胁最大的美国,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英法等西方国家可以作为人民的“间接同盟军”的重要思想。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超越意识形态的分歧,逐步调整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国不仅继续积极发展与亚、非、拉国家的关系,而且开始重视同处于第二中间地带的西方国家改善和发展关系。1964 年 1 月,中法两国排除障碍,宣布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这对打破美国孤立中国的政策具有重大意义。之后,中国又先后同意大利和奥地利达成了互设贸易机构的协议。中国同第二中间地带国家的关系开始发生某种积极的变化。

为了反对对中国和世界和平威胁最大的美国,毛泽东认为,应当利用帝国主义营垒中的矛盾,建立起最广泛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由于这一时期中苏关系也在恶化,毛泽东在倡导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同时,也在考虑建立另一条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问题。不过,在毛泽东看来,这两条统一战线的侧重点,仍然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1965 年 5 月 12 日,毛泽东在《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声明》中发出号召:“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联合起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联合起来,全世界各大洲的人民联合起来,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联合起来,所有受到美国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②毛泽东倡导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强调要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寻找国际上的同盟者,甚至同以往的敌人建立合作关系,来应对中华民族所面临的最主要的安全威胁,维护世界和平。

五、有理有利有节

坚持有理有利有节,是毛泽东革命生涯中同国内外反动势力进行政治、军事斗争的一个基本原则。新中国成立后,在处理中美军事冲突中,毛泽东亦不例外地坚持了这一斗争原则。

一是师出有名。师出有名,是现代战争决策者追求战争合法性,为发动或参与战争赢得道义支持而坚持的一个重要原则。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出兵抗美援朝中就注意把握了这个原则,为我军介入这场战争赢得政治上的合理性。出兵抗美援朝是毛泽东一生最难做出的抉择之一,但最终他力排众议,毅然做出出兵决策,其理由可能是多方面的,但主要还是毛泽东对国家安全和主权完整受到威胁的考虑。1950 年 6 月 27 日,美国宣布台湾地位未定,并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侵犯了中国的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阻碍了中国统一大业。也就是说,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首先把中国摆在了其对立面,严重危害中国的根本利益。不仅如此,美国进一步扩大朝鲜战争,将战火从朝鲜烧到中国东北和山东半岛的青岛、烟台等地,严重威胁着中国的国家安全尤其是东北工业基地的安全。毛泽东 1950 年 10 月 13 日在致周恩来的电报中指出:“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引住,南满电站将被控制。”^③而且,中国不可能允许另一个大国侵略自己的邻国,把它的军事势力一直延伸到中国的家门口。如果对此听之任之,中国就没有安全可言,没有国格和尊严可言。所以,毛泽东说:“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④周恩来说:“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

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⑤。可以说,这些是毛泽东决定出兵的十分正当的理由。归纳起来,当时流行的一句口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十分贴切地反映了毛泽东对出兵问题的上述考虑。所以,尽管从总体上讲,中国是被迫卷入这场战争,但当战局的发展明显威胁到新中国的安全利益时,毛泽东最终下定了参与这场战争的决心。这对于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无疑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对当时的国际舆论来讲也是合情合理的。对我方来讲,出兵抗美援朝,师出有名,因而它是一场正义的战争。

二是无理不动。在应对新中国成立后中美几场军事冲突中,毛泽东出兵决策中最关键的环节是确定出兵参战的底线。在朝鲜战争中这条底线是三十八度线,在越南战争中是十七度线。实际上,毛泽东把美军是否越过三八线或十七度线作为判断美国对中国安全构成威胁的标准了。当“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时,美国军方有人认为,中国出兵的最佳时机不是10月,而是7、8月美军南朝鲜军退守釜山一隅,战争一度可能出现美国的敦刻尔克的时候。中国那时出兵可能将美军赶进大海。但中国却选择了美军士气正旺的10月中旬出兵朝鲜。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已经突破了我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底线。毛泽东认为,三八线是一条底线。他后来回顾说:“美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如果过三八线,我们一定过去打。”^⑥中国强烈的预警信号就是在美军接近这两条线时发出的。在中国看来,这两条线规定了避免中美直接对抗的安全距离。以这两条线作为出兵参战底线,也表明中国当时的态度是防御性的,而不是进攻性的。另外,越南战争初期,中国规定对入侵中国领空的美机只派飞机监视,不主动发起攻击。1965年4月,针对美机攻击中国飞机的情况,中国军方立即决定改变以往决定,对所有入侵中国领空的美国军用飞机“坚决打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和空军部队进行了保卫领空作战,在海南岛、广西地区连续击落入侵美机。这说明,毛泽东在处理中美军事冲突中,始终坚持有理有利的原则,掌握军事行动的主动权。

三是见好就收。适时结束战争,见好就收,是战争决策者进行战争决策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中美军事冲突中,毛泽东并非企求取得决战到底的彻底胜利,而是在一定的政治利益获得满足后寻求结束军事冲突的时机和方式。在指导抗美援朝战争中,毛泽东在军事态势有利于我的情况下,适时调整战略目标,适度控制战争的规模和强度,寻求早日结束战争。其实,早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确立了有限的战争目标。1950年10月24日,周恩来在政协的一次会议上指出:“美帝国主义用武力压迫别国人民,我们要使它压不下来,给它以挫折,让它知难而退,然后可以解决问题。我们是有节制的,假如敌人知难而退,就可以在联合国内或联合国谈判解决问题,因为我们是要和平不要战争的。”^⑦此后一段时间,他又反复指出: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美国知难而退”,使战争“局部化”,迫使它接受和平。“我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就是要争取这种可能的实现,我们相信自己的力量是可以争取这种可能的实现的。”^⑧在第一次战役打响之前,毛泽东一直强调:“我们应当从稳当的基点出发,不做办不到的事”;要力争首战胜利,以“迫使美国和我进行外交谈判”^⑨。这说明,中国参战所要达到的目标是有限的,这为战争过程中“见好就收”定下了政策基调。中国人民志愿军通过五次战役,共歼灭“联合国军”23万余人,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这种战役相持的局面,为迫使美国同意举行停战谈判创造了条件。1951年5月1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一项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敌对行动的建议,得到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批准。毛泽东敏锐地把握住这个机会,适时调整战略方针,准备通过和谈结束战争。因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充分认识到,经过连续五次战役的反复较量,特别是第五次战役的较量,依靠志愿军现有装备和条件,短时间内不可能迅速歼灭敌军有生力量,根本解决朝鲜问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研究决定,实行边打边谈的方针,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双管齐下。据此,中共中央确定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指导方针,为即将到来的停战谈判做好多方面的准备。

同样,在指导20世纪60年代援越抗美斗争中,如何避免同美军发生大规模直接冲突,特别是要防止美国把战火扩大到中国境内,是毛泽东始终高度关注的问题。所以,在应对这场援越抗美的斗争中,毛泽东也十分注意把握行动的分寸,在美方没有突破中方底线的情况下,决定适可而止,见好就

收,避免中美冲突进一步升级。在应对美国战争升级时,中方竭力使美国明白,中国无意挑起对美战争,中国的反应将是对等的:如果美国的军事卷入仅限于越南南方,中国就不会派兵参战;如果美国对越南北方的入侵只限于海空作战,中国派出的参战部队也限于在越南北方的防空、工程和后勤保障等方面的军事活动。这些情况表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并不想在印度支那半岛使中美再次爆发“朝鲜式战争”,因此对援越抗美行动也是有所节制的。美方显然理解了这一点,始终没有派遣地面部队进入越南北方。1968年3月,美国将对越南北方的轰炸范围限制在北纬20度线以南地区。5月,美国同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巴黎进行和平谈判。10月31日,美方宣布,完全停止对北越的轰炸。从1969年1月起,美国侵越战争进入所谓“越南化”阶段。此后,经过中越双方的协商,在越南的中国支援部队于1970年7月全部撤出越南回国。

注释:

①⑤⑥⑪⑫《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460页、第461页、第460页、第407页、第306页。

②④《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86—387页、第246页。

③⑦⑮⑲《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48页、第127—128页、第569页、第144页。

⑧⑩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861页、第863页。

⑨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76—77页。

⑫《毛泽东听取贺龙、罗瑞卿、杨成武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5年4月28日、29日》,转引自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47页。

⑬袁德金:《毛泽东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思想的提出》,《军事历史》2010年第5期。

⑭《1964年7月2日毛泽东在听取周恩来等汇报工作时谈话的要点》,转引自《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43—244页。

⑮⑲《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07页、第197页。

⑯《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581页。

⑰《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

⑱⑲⑳《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99页、第404页、第140—141页。

㉑总参作战部:《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1964年4月25日),《新中国成立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页。

㉒《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7页。

㉓《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举行的建国一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报告》,1950年9月30日。

㉔《毛泽东同苏共中央代表团谈话》,1956年9月23日。

㉕⑳《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5—76页、第92、109页。

(责任编辑 朱加荣)